

主编 皮明庠

武汉通史

先秦卷

刘玉堂

王本文

张硕 著



武汉出版社

武汉通史

先秦卷

刘玉堂 王本文 张 硕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通史. 先秦卷/刘玉堂、王本文、张硕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6(2008. 2 重印)

ISBN 978 - 7 - 5430 - 3296 - 5

I. 武… II. ①刘…②王…③张… III. 武汉市 - 地方史 - 先秦时代

IV. K296.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531 号

书 名:武汉通史·先秦卷

主 编:皮明庥

著 者:刘玉堂 王本文 张 硕

责任编辑:萧德才

封面设计:吴 涛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华运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3 字 数:320 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680.00 元(共 10 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武汉通史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殷增涛

副主任 车延高

杨卫东

顾问 章开沅

编委 张述传

刘志辉

彭小华

周茂棣

刘东才

涂文学

朱英

姚卫东

周才志

李策

朱毅

皮明庠

冯天瑜

李强

余茂才

唐惠虎

易福才

刘玉堂

陈芳国

严昌洪

郑自来

徐明庭

刘顺妮

朱雷

方精华

张福来

程玉平

聂建新

李怀军

吴剑杰

洪涛

张启亮

刘庆平

武汉通史编者

主 编 皮明麻

副主编 刘玉堂 涂文学

李怀军 陈芳国

武汉通史·先秦卷作者

刘玉堂 王本文 张 硕

序 言

李宪生

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武汉通史》7卷(10册)本,在编撰人员的艰辛努力下,历经磨砺,终于问世了。该书卷帙浩繁,饱含历史厚重,详尽地向读者讲叙武汉的缘起及数千年发展史。它的出版,是武汉历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成果,也是武汉文化建设的一项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武汉,有着 3500 年建城史,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近代工业重要发祥地和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在中华民族辉煌璀璨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史实。她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个性魅力,是我们永远的骄傲和自豪。840 多万生於斯、长於斯的武汉人,牵系着城市的兴衰和发展,眷恋着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域外人士关注着武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适时编纂出版《武汉通史》,有利于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武汉、建设武汉的热情,有利于外界更好地了解武汉、认识武汉。

《武汉通史》不仅客观地记载了武汉发展的史实,而且具有独到的学术视野。它不同于断代史或专史,而是一部研究、综述武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的“通史”。它从城市发生学的视角,以城市发生、发展、演变为主轴,提出了 3500 年前的盘龙城是武汉城市的端始、“三国兴汉”等论断。它将城市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从而将漫长而又复杂的武汉历史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它释难解疑,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如武汉历史上存在一个较大的商文化区;武汉古代文化是华夏文化和楚文化等的融合;武汉经历了张之洞时代城市又一次崛起等。这些观点,鲜明独特,精当确凿,读后可以得到很多启迪。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武汉,在历史上经历过一次次崛起。商代时,

盘龙城就是商代在南方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东汉末和三国时,在龟蛇对峙、江汉交汇之处崛起了郢月城、夏口城。南北朝时武昌就成为鄂东南地区中心,到元代更发展成为湖广大区域行政中心。汉口在明代前期形成后虽遭受明末战乱,但在清代早期又迅速崛起成为四大名镇之一。晚清时,张之洞以新政引领建设,把武汉建成初步近代化的工业基地、商业重镇和文教中心。从武汉的兴衰中,我们看到了武汉自我崛起的力量。

历史曾厚爱过武汉,今天又给武汉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把武汉推上了新的发展起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尊重历史、研究历史,从历史的纬度把握市情,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取教益,充分认识并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加速推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努力实现武汉在中部地区的率先崛起。

序 言

殷增涛

历时五载,煌煌 400 多万字的《武汉通史》面世了,这是武汉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突破。

武汉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从万年前汉阳人昭示长江中游人类生命纪元,到 3 500 年前盘龙城开启武汉城市文明之光;从炎帝、大禹的远古传说,到孙权、岳飞的屯兵旧址;从林则徐武汉发动湖广禁烟,到张之洞督鄂推行“新政”;从“辛亥首义”打响反封建第一枪,到“武汉保卫战”遏制日军侵华之势……武汉历史的每一个断面,都在向人们述说着这座城市之重。

在“八五”期间,在国家社科规划中,武汉是全国城市史研究四个重点城市之一,在城市史研究领域有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武汉史稿》、《近代武汉城市史》、《武汉市志》、《大武汉旧影》、《中共武汉历史图志》等一批专著先后出版,再现了武汉昔日的落寞与辉煌,让广大市民更为熟识自己生活的城市。但城市通史研究领域一直没有专著,《武汉通史》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武汉通史》共七卷,计十册,内容上起远古,下至 2004 年,力求揽武汉历史之要,展武汉成长全景,贯穿古今,横通社会。本书以武汉形成、发展所显示的阶段性为据,分五个历史时期,对波澜起伏、雄伟壮观的武汉历史进行勾勒。本书坚持论从史出,为史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不虚构夸张妄断。编者视野恢宏,立意高远,历史大事与历史人物并重,对武汉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建制以及地理、风土人情全方位扫描,有助于人们立体认知武汉。本书又专设图像卷,选图 1 500 张,彩色印制,置全书之首,图文并茂,以图说史,视觉冲击力强劲。

萤窗雪案,史海弄潮。通史凝聚着一批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智慧,他们或为大学和科研所学者,或是武汉科研文化部门熟悉武汉史的专家,皆胸

怀江汉,究心文史,严谨治学,长年在故纸堆中“作乐”,其中甘苦自知。主持编写通史的皮明庥研究员,多年来醉心于武汉史研究,为促成通史编撰,上下奔波,四处考证,先后摘抄、查询有关资料数百万字,收集史料期刊逾千册,其对武汉独钟的情怀,对史学执着的追求,令人击节!参与编撰工作的其他专家学者,俱是潜心研究、严谨治学,精神亦可钦可敬!

盛世修史,意义重大。爬梳城市轨迹,发掘城市精神,记忆武汉,认知武汉,是武汉城市和市民走向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也为后来研究者确立了可资借鉴的路标。历史由人评说,史学著作也得让人评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成书后,说自己是“诚惶诚恐”。我想,在《武汉通史》付梓之际,参与编著的专家学者更多的应是“如释重负”、“引以为豪”。固然,《武汉通史》系开拓性的著作,难免会有历史性的局限,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相信广大读者不会苛求。

《武汉通史》卷帙繁多,篇幅巨大,通读费时。为了普及武汉历史知识,在编撰通史基础上又编成《简明武汉史》,向读者介绍武汉的历史进程、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一册在手,可得《武汉通史》之精要。

大江东去浪淘沙,阅读历史知兴替。《武汉通史》和《简明武汉史》带给我们的,是数千年武汉历史烟云和烟云散尽后留下的思索。

《武汉通史》编撰述略

皮明麻

一、编撰《武汉通史》缘起

作为祖国中部中心城市的武汉,其有征之历史非常漫长。远在距今1万——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就有“汉阳人”生息劳作,距今5000年前之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00多个,黄陂区之盘龙城为距今3500年的商代早期城址,到三国时今之市中心区形成双城机制,元代(宋已开始)确立为湖广地区首府。晚清成为近代都会。当今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

对武汉的历史,《尚书》、《诗经》及《左传》等先秦典籍和历代正史、地方志中都有记载,乌程范锴之《汉口丛谈》、罗田王葆心之《续汉口丛谈》、胡凤丹之《大别山志》、罗汉之《汉口竹枝词》等是具有丰富史料价值的写实性作品,它如导游性书籍《武汉指南》也叙介了武汉之大观。但是掩卷深思,有关武汉史载记仍很不足,远不及上海。许多载记语焉不详,解放前无一本较为全面系统的武汉历史著作,民国时治湖北武汉地方历史之王葆心先生就浩叹“淞沪大埠,自古纪述良夥”,“汉口则记者寥寥”。

我本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接触武汉历史,也读到一些很不错的文著,但苦于觅寻不到一本称得上是武汉史的书籍。社会上对武汉史的理解,一半是残缺不全的记载,一半是传说猜测。譬如武汉城市源头何在?武汉何时入楚?市中心区起于何时?汉口何时形成?武汉何时建市?知音故里在何处?如此等等,即便是“老武汉”也有些茫然。在这种困惑中,我从质疑问难中萌发出探索兴趣,但当时我并非专业研究人员,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已。“文革”中,我被派往武昌农讲所临时工作,倒给了我较集中探索武汉现代革命史之机遇。1978年后我先后到大学和科研单位工作,这样就成为一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員,于是便着意于武汉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先后著述和主编《武汉近百年史》、《唐才常与自立军》、《武汉通览》、《武昌首义史事志》。90年代出版《武汉史稿》、《近代武汉城市史》、《汉口五百年》等作品。1988年6月15日,我在编《武汉历史举要》序言中说:“以期在此基础上编《武汉通史》时,更有几分把握”。我当时认为,编《武汉通史》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浩繁艰巨的学术工程,我们编的这些书,都是尝试,是为编《武汉通史》投石问路的前期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有机会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社科课题“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武汉与上海、天津、重庆三城市的城市史研究一起并列为四个重点研究课题。几年间,四城市联系密切,多次互访,受益匪浅。不久,四城市写成专著,为中国城市史学科的兴起进行了开拓。上海市更乘胜前进,将城市史研究拓广到东南沿海,并著成洋洋大观的《上海通史》15卷。与此同时,《北京通史》亦问世。稍后《湖北通史》也正式出版。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编《武汉通史》的决心。

是时,武汉市属有关单位,都从各自业务分工出发,开展有关武汉文史探索。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12年之久,编成28卷之《武汉市志》,堪称武汉近现代百科全书。他们并出刊了《武汉春秋》。武汉市档案局编成了《大武汉旧影》、《武汉解放》等具有档案特色的专著。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了《中共武汉史》、《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图志》等许多专著。市政协创办了《武汉文史资料》期刊。他如《汉口丛谈》由武汉师院江浦校注,《武汉竹枝词》由武汉图书馆徐明庭校注出版。武汉地区各大专院校也不时有研究武汉的文著问世。这一切大大增强了我们编撰《武汉通史》之信心。尽管如此,《武汉通史》编撰工程一直未能启动。

1998年,时任市委宣传部长李先生提出这一课题,我们开始策划。2000年,经韩忠学副书记、叶金生部长批准立项,正式投入编撰。之后,又得到市委副书记殷增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车延高、副市长刘顺妮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与事作者潜心著述,经六年笔耕,终于完成。这部书之所以能结集问世,一靠作者之群体努力;二靠市财政支持;三靠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以及市社科院、市社联的支持。

二、《武汉通史》范围之设定与叙史原则

编《武汉通史》是贯穿古今、横通社会之全景式学术工程,不同于某一领域(如政治史、农民运动史等)之专史,亦有别于某一断代史,而以通武汉古今之变、观武汉社会之状为基本构思。全书战线长,又囿于武汉一隅,从而衍生出撰著中之诸多难点。如叙述全国全省问题,回旋空间大,史料可异地寻觅,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武汉之范围有限,史事史料较少,易于史阙无征,出现缺环。如何驾驭《武汉通史》这一课题,就成了“烫手的山芋”。在编纂中,经反复琢磨,才形成《武汉通史》基本构思:

第一,对武汉历史作长线铺叙,上起远古,依史料而定详略,下限为2005年本书完稿之日。

第二,对武汉之范围作历史的把握。武汉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昔之武汉非今之武汉,其疆域代有不同。本书以传统武汉三镇为核心,以今之武汉行政区划为基础,以与武汉有密切关系和历史渊源之市县为相关区,形成大武汉地区,作为本书涵盖范围。不囿于今武汉行政区划。古江夏郡、郢州、鄂州、武昌府、汉阳府所辖州县,与作为治所之江夏(今武昌)密不可分,故本书不能不涉及今鄂州市等市县。鄂州市即古武昌。

第三,以历史事件(含政治、经济、军事)为经,以社会状况为纬,尽量全方位叙述武汉。各卷中,一般先叙政治、军事大事,后叙社会、文化。力求博洽贯通,某些方面达到发微表征。

第四,在叙述历史进程中,对武汉城市影响巨大之历史人物,在相应时段进行介绍,以彰先贤启后世。

第五,叙史立传,贵有依据。本书以文字记载、考古记录、照片资料等为据,重在史实,还历史本来面目,不虚构夸张和妄事推断。“考沿革,取兹载籍,非臆断所能为”(章学诚语)。但古今多传说,遗址多故事。遥远之故事传说,既是民俗民风之体现,亦可能是历史之折射,但不是信史。本书凡属无确证之传说故事,在行文中均说明为“据传说”,以备参酌。

第六,对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有争议问题,有定论和共识者均以定论、共识书写。如本书著者有新论,有异于定论和共识,则在文中有以说明。对无定

论有争议问题,则以一说为主,多说兼存,加以介绍。对当前尚未研究清楚之问题,特别是建国后的一些问题,只略有提及以存史,而不作具体述评。

三、《武汉通史》之规模、分卷与武汉历史之分期

《武汉通史》共分7卷,计10册。全书400万字左右,图照1000多张。七卷为:图像卷、先秦卷、秦汉至隋唐卷、宋元明清卷、晚清卷(上、下册)、中华民国卷(上、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上、下册)。分卷主要是根据历史发展顺序,结合篇幅大小和作者分工而划分,不完全体现历史分期。

武汉历史分期与分卷有别。武汉历史分期以武汉形成、发展所显示的阶段性为据。武汉有核心区、外缘区。江汉交汇之武汉三镇为核心区,古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之外为外缘区。武汉之形成是先外后内,由外缘作向心运动,形成核心区。以后又从核心区扩展,激活外缘区。据此,我们将武汉历史大致界定为五个时期:

一为从远古到秦汉,武汉外缘区的率先开发期。

二为三国至隋唐,武汉核心区和双城机制形成和发展期。

三为宋元明清,湖广大区域行政、经济中心和三镇鼎立格局的奠定期。

四为晚清至民国的近代都会期。

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新型特大城市发展期。

这一分期既以武汉形成发展的历史所显示之阶段性为依据,又结合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体系和国家变迁。分期与分卷有套合之处,如近代都会期含晚清和民国两卷,而先秦卷加上秦汉至隋唐卷之秦汉部分,同属第一期——武汉外缘发展期。秦汉至隋唐卷之三国以后部分为第二期——武汉核心区和双城机制形成发展期。由于分期不能从分卷中完全体现,我们在各卷行文中对分期均有所交代。

四、《武汉通史》图像卷

本书原拟在各卷中插图,但尝试后未能尽善,遂决定专设图像卷置为后卷。读者阅读本书,可结合图像卷对武汉作通体形象了解,在披览各卷文字时,亦可查读图像卷相关图照以印证。

自古以来,文字乃记载历史、言状事物之工具,然文字起源亦结缘于图画,我国古老之甲骨文多象形字,象形字即依客观事物之形体,以简练之线条刻画而成。通过象形、形声等六艺,我国形成庞大字库和语言系统。但文字叙事状物难以至善,故又假诸图画以补其不足。历代丹青妙手创制之山水、人物、翎毛画,既为艺术品,亦为社会历史、自然风貌之刻画,具有存史之功效。观北宋张择端之《清明上河图》、明代《金瓶梅》之版画,虽不能代替读长篇大论之《宋史》、《明史》,然在某些局部,如对社会百态的认知却更为具象。及至 1840 年前后,欧洲发明照相术,并很快导入中国,由于照片更能纪实留真,让人领略历史之原汁原味,达到与文字记载互补,即使千百年前发生之历史事象,亦可就遗址遗物进行追拍,传出历史之真实。因此我们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在各大单位的合作下,收集武汉历史图照数千幅,经别择筛选,取具有历史价值又清晰可观者汇为一册,以兹浏览。

五、作者和史料

编撰《武汉通史》的基础在于史料,决定编写质量的关键在作者。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一直把收集资料作为此项学术工程的起点和基础。参加过此项工作的范植清教授从事过 20 多年武汉史研究,长期在省图书馆查询检阅。当初编《武汉史稿》时,她就不畏艰难,广泛涉猎二十四史和地方志书。远在 20 多年前,我就请当时编长航史的汪鹤年同志将古籍中有关武汉的记载摘抄了约 30 万字资料。2002 年,我又请张德英、孙式礼先生等检索省图书馆史料,诸先生年事虽高,仍全力支持,查询和复印有关武汉资料 200 万字。我自己投入史料爬梳还要早些,跑图书馆、开展现场调查以及在书摊找旧书成为几十年来常涉不辍的乐事。

作者是编著《武汉通史》的关键。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编写班子宜小而精,重在学养有素和勤于著述,要实现学院派和乡土派的结合。参加此项工程的主力作者约 20 多人,各具专长。他们有的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学者,有的是在武汉市各区、局工作熟悉武汉史事的专家。事实表明,学院派和乡土派的结合,实现学术互补,有助于著述水平的提升和减少编著疏漏。

令我没齿不忘者,是与事之各学者,在担负繁重教学和行政工作同时,

投入本书的编撰。特别是刘玉堂(负责先秦卷和秦汉——隋唐卷)、李怀军(负责宋元明清卷,并参与其他卷)、涂文学(负责民国卷)、陈芳国(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同志鼎力相助,既主笔政,又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赵庆伟、吴成国、王本文、张硕、陈绍辉、陆静卿、刘庆平、涂天向、朱莉等精心完成了著述和图片编汇工作。尤要述及的是范植清、刘美崧教授。范教授在投入此项学术工程不久即逝世。其未竟之业由刘美崧教授承担。但天不假年,刘教授在完成著述后又辞世。每念及二位教授成年累月跑图书馆,以及不辞辛劳赴鄂州、新洲考察史迹的学者风范,令人钦之、敬之、悼之。

至于我本人投入《武汉通史》之项目策划和编撰,也算是完成了数十年的宿愿。我生于江西萍乡,但从1951年调入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政教系学习时就结缘武汉,半个多世纪来绝大部分时间在武汉。武汉也就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几十年来,我对武汉之了解与日俱增,对武汉之研究也兴趣日浓。从20世纪50年代阅读有关武汉的书刊始,60年代从事业余研究,七十年代后期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开始写作有关武汉的专著和文章,20世纪末策划《武汉通史》。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授权下,我的第一件工作是精心延请作者,第二件工作是共商各卷要旨和提纲,第三件工作是协助作者,在可能条件下为作者提供资料,与作者共同研磨初稿。而研磨初稿,进行修改、补充,是最为繁难的工作。要理清源远流长的武汉历史线索,还历史以清晰面貌,尤其是解析武汉历史中的一些盲点、难点,确非易事。我们只能迎难而上,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减少失误。

在书稿送出版社后,出版社认真进行编务加工,特别是肖德才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并组织力量进行审读和校对。在正式付印前,刘玉堂和皮明庥又对先秦卷、秦汉隋唐卷、李怀军对宋元明清卷、陈芳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宋晓丹、张广立对民国卷、陈钧对晚清卷进行校读。

在这一过程中,我深深感悟到史学作为一种朴学,其为学之道固需文才,但重在学养,贵在积累,不以近利是图,应以求真为本。《武汉通史》是一原创性的学术工程,不能只靠才气去挥洒,而应以大量收集史料、理清史实为基础,否则立论无据,就成为无本之木。武汉历史漫长,文化底蕴深厚,要穷其究竟,必须尽最大可能爬梳文献典籍,发掘地方史料,汇纳民间

珍闻和口述历史,征集图片,深入实地考察,乃至阅读有关诗文。在此过程中,我们特别征集了黄陂、新洲、汉阳、蔡甸、江夏等区地方资料,并得到各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总之,我们在编撰中,采掇求广求精,以求得对武汉历史较有把握和系统的认识,理清武汉城市的历史脉络。特别是武汉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聚讼纷纭的问题,尤需探求真相,排难解疑。这是我在几十年治学中所不曾懈怠的工作,尽管自己学力不逮,知见有限。

所幸各位作者都奋力笔耕,迎难而上,著成初稿。应该说,由于作者素养和才识,写成的初稿都有相当水平。后来,有的作者外调,有的作者去世,有些书稿不完整或未交稿,其修改、补充、定稿工作由作者和我组织人力完成。全书(另有简明武汉史一册)400多万字、1 000多幅照片,我都耐着性子从头到尾进行了研读,对有的书稿读、校、补三四遍。既向作者学习,也与作者磋商,虽然十分费力,但个人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

本人虽究心文史,度德量力,不堪编《武汉通史》之任。然各方所期,龟勉从事,于兹六载,寒暑昼夜,困扰烦辛,酸咸苦辣,五味备尝。六年来迎难而上,爬梳董理,不计成败,弗论效益,每独处窗下,埋头故纸堆中,寂然于笔墨之间,然心在江汉之上,时时刻刻沉浸于研究武汉这一领略不尽之城,此中之乐,融融无尽。“通史”之作,兹事体大。本人学力有限,涉历不周,故全书错讹挂漏自知非鲜,悬望方家及广大读者赐教指正。

前言

刘玉堂

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草莽初辟时代,人类怀着童贞的梦幻来到长江与汉水交汇之滨,编织着江汉文明的花环。关于武汉远古时期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是传说与猜测参半,真正揭开武汉远古之谜的,是解放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随着国家基本建设工程的频频动土,那些长眠地下的远古遗迹纷纷重见天日,向世人诉说着武汉童年的往事。

在武汉附近的大冶章山村(现属黄石市西塞山区)石龙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说明至少在距今 28.4 万年以前,人类已踏上这片热土。在武汉市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星罗棋布,其中大多属于屈家文化范畴,距今约 6 500—5 000 年的放鹰台、老人桥、马投潭、许家墩、棋子墩等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初步勾勒出武汉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轮廓。

假如可以把炎帝神农氏当成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看待的话,那么,江汉地区传说中的先祖就是这位居功甚伟的奇人。虽然神农诞生于武汉北部 165 公里的随州厉山只是一种传说,但炎帝神农部落曾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栖息劳作,当不是纯粹的推测,因为炎帝神农部落既然以汉水中游为活动中心,自然不会画地为牢,近在咫尺的汉水下游地区不可能不吸引他们前往。不过,若以族系划分,武汉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先民应是三苗,还夹杂着濮、越等古代民族,尽管他们进入武汉地区的时序不一且居留不定,都不能动摇三苗作为武汉地区主体民族的地位。随着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三苗已不满足于世代居住的以江汉地区为腹地的南方,为扩大地盘和发展势力,开始北上与尧舜争锋,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在南北两大部落集团之间展开,武汉地区因之成为重要战场之一。